

谣空中楼阁中的编遣会议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一时间，各路风流人物纷纷聚集于有着浓厚历史积淀的古都南京，卷入了一场权与利的争夺，公正与野心的较量。蒋介石、吴敬恒、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人杰、蔡元培、白崇禧、孙科、李济深、何应钦、宋子文、商震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等100人出席了会议，王村常代表张学良，陈季良代表杨树庄等共100人列席了会议。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全国编遣会议不是一般的政治会议，其中蕴藏着不凡的权力与派别之争。然而说到底，全国编遣会议不过是蒋介石为建立和巩固其军事封建的独裁统治，以统编全国军队为名，实现其削弱、剥夺各实力派的军权，扩大其嫡系势力之实而举行的新军阀之间的争吵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的完成，标志着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开始。然而，在地方，各派军阀名归中央，实则养精蓄锐，做着强有力的无言抵抗。冯玉祥在西安举行阅兵仪式，向蒋介石炫耀武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山西进行作战训练，李宗仁在武汉实行兵工政策，以图保存实力，白崇禧在河北大搞军事会操，并电陈南京国民政府《西北戍边计划》，图谋进兵西北……。虽然，全国上下已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但实际上中国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军阀割据仍未消除。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蒋介石怎么能不担心刚刚到手的大权和宝座呢？于是乎，一幕全国编遣会议的闹剧上演了。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在剧目上演之前,蒋介石做了一个聪明的前期策划。他看好了各军事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冯派和阎派,让其各自拿出提议以便共同讨论裁定方案之用。冯玉祥认为自己兵多素质好,战功最大,提出的方案可以说是“损人利己”。因此引起了其他各派的强烈反对,成了众矢之的。阎锡山本与冯玉祥有矛盾,又深恐蒋、冯合作而使自己的势力受到威胁,于是提出了一个既讨好蒋介石,又能使冯玉祥以外其他实力派也可以接受的方案。于是,阎锡山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伴随着各派人物的利益之争,伴随着蒋介石的两边挑拨,一场以统一政府改组军队为名,以心怀鬼胎,扩大势利为实的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始了。

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至于按照什么标准编遣,“本人没有成见,……。现在冯、阎两位总司令都准备了一个提案,可以供大家参考研究。”于是,蒋介石把自己放在中间,以“公允”的态度,以“旁观”的冷眼,看着这一场各派的争吵与攻讦,以待收渔人之利,大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员月,远日,蒋介石发表了《编遣会议宣言》,简述如下:“本会遵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之决议,依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之条例而组织,宗旨在编遣国军,整理军事,解军额过剩之弊,谋统一建国之实。……而目前全国希望最切之事项,当为战后停战之军事如何整顿划一,以统属中央,全国过剩之军额,如何切实缩编,以免除国家人民无府之殃。……本会员此使命,敢不努力以赴之,虽研究余日,自有待于会议之决定,而下列数项,则为本会所公认为必中之信条,敢先负责宣言,以答邦人之望。(一)曰不偏私。……(二)曰不欺饰。……(三)曰不假借。……(四)曰不中辍。……右之四端,虽未足以尽本会全部之使命,而实本会所愿奉以周旋之精神。深维我国百年来之军事历史,不惟贻祸于国家人民,亦以自相犯残,授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之机会,此实民族之不幸,亦为军人之耻辱。今当军阀清除,国家前途始有一线之

曙光 是当急起直追 不容再误。本会敬以革命之决心 痛切自誓于党国旗与总理遗像之前 务本上述四项之原则 贯彻整理军事之全功 爰昭告全国同胞同志 惟相与戮力以助之。”

是的 此时的中国不容再误 而这一线之曙光的到来却又被再误了。

大多数到会者推阎反冯 成为趋势。蒋介石看到自己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就表态说：“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会议经过了多次争吵 最后确定全国设八个编遣区。于 11 月 15 日第四次会议又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后来 又定全国编遣委员会为常设机构 以阎锡山为组长。内设总务、编遣、遣置经理四部 各部主任为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宋子文。而具体编遣如下：

《程序大纲》规定：“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 上予取消。取消之后 即设编遣区 各编遣区办事处 承编遣委员会之命 于编遣尚未完毕以前 负责交代办理一切。其各部队原有官长 照旧供职 听候编遣完毕 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编遣时期非呈明编遣委员会 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至此 我们便可以明白蒋介石的心思 那么 冯、阎、桂、粤（李济深）等各派更是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由彼此的相互攻讦转而变成将矛头共指一方 使得原本吵吵闹闹的会议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各派到会者“消极抵抗” 不再参加这“损己利人”的讨论。直至最后 深得蒋介石扶持的阎锡山提出“现在离阴历年不远” 要求暂时休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各派的一致赞同。无奈之下 蒋介石妥协了。

11 月 15 日 编遣会议闭幕。这次会议表面上产生了一些结果 但实质上却加剧了蒋介石与冯、阎、桂的矛盾 由于各派的抵制和反对 会议通过的宣言、大纲、条例 都成了一纸空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同年 愿月 员日至 远日 ,蒋介石又召开了“国军编遣实施会议”,并在《闭幕宣言》上说:“……两次会的性质稍有不同。今看会议的是纲领原则,这次会议是求行”。会议期间的确通过了一些原则、草案,商讨了一些具体问题;但由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巨头没有出席会议,裁军方案更无法付诸实现。也许这会是 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但蒋介石和各军阀本身身份决定了他们似乎对这个历史重任难以担当。蒋介石也曾哀叹:“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然而这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便诉诸于战争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规模更大的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正是全国编遣会议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正如当时《大公报》的记者评述:“编遣会议在筹备期间,已多扞隔,开会之后,益党仳离,不特蒋桂之战,与相关联,即蒋冯之争,亦种因于此。”于是中国大地上的战争又延续了若干年。

圆摇杨、常事件

一提起张学良将军,也许连小学生也会知道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逼他抗日。这可以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和卓越的政治头脑,但又会有几人知道这位圆岁少帅背后的坎坷与挫折,奋斗与拼搏呢?身处奉系军阀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集团中,靠继承父业而跃身为军阀首领,倚老卖老的“元老”怎会从一个刚出炉的“毛头小儿”的调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张学良毅然清除了“杨、常”二人,从而使奉系军阀不再堕落下去,自己也“稳坐泰山”,可以“高枕无忧”了。

军阀内部几乎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结党营私,欺压异己。奉系军阀内部也是如此。很早以来,奉系军阀内部就存在多种矛盾,有老派、新派之别,亦存洋派、土派之争。由本身利益决定,老派与洋派观点一致,对外亲日,对内好战,思想反动,属于守旧派,以张作霖、杨宇霆为总代表;新派与土派(亦称大学派),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励精图治,发展实业,思想趋向进步,属于革新派,以郭松龄和后起的张学良为代表。随着奉系集团的崛起,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争斗亦日趋尖锐化。可以说,圆年底郭松龄举兵反奉,是两派矛盾发展的第一次公开较量,而圆年初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则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和最后的解决。在张学良同杨、常(主要同杨)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遂产生流血事件。

就在郭松龄举起反他老爸的旗帜时,他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尽管其父对他一再责骂,也骂不去他对郭松龄由衷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的钦佩之情。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处理问题,这正是他人格的闪光点,而后发生的“杨、常事件”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

杨宇霆、常荫槐可谓奉系军阀内部的两大蛀虫。杨宇霆靠着巴结讨好张作霖和钻营投机的手段而深得张作霖的宠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杨宇霆也以诸葛自命,骄纵恣睢,不可一世”,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次,在家乡法库修造祖坟时,曾发现一个石像,杨宇霆私养的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巫神)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说这是有“九五之尊”的征兆,杨信以为真,更加滋长了野心。后还纠集了一个请愿团到北京见张作霖,要求主政东北,被拒绝,张学良“东北易帜”一事,他也要横插一腿。他一向对张学良的态度就是不予理睬,从以上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杨有蓄意夺权之势。杨还是张作霖发动和参加军阀战争的鼓吹者和主要支持者。他一直教唆张作霖“与直系一决雌雄”,发动了两次直奉战争,但当杨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驱时,他“计无所出,尽搜刮中国银行所有现款”,从南京坐压道车狼狈逃回。事后,杨为雪耻,极力怂恿张作霖再战。1925年10月,当上安国军总参议的杨为张作霖制定了进攻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军事计划,并声称一个月就能取胜,到那时,“大帅”就能被“万民拥戴,世界钦崇”。由于这一计划正中张作霖下怀,因而博得他“拍案叫绝”。从1925年底起,在日本唆使下,蒋介石与张作霖暗中疏通。杨曾说:“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之压迫,则南北妥协非不可能之事”,这完全暴露了杨反人民的本质。奉系军阀的连年内战,给东北和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1925年10月《申报》报道,当时奉军统治天下的山东,出现了“一百零八县已有四十八县无人烟,待车出关之难民达四百万人”的悲惨情景。杨对爱国将领郭松龄一向持敌视态度。郭松龄深知“杨之为,人残忍成性,阴险成性”,他对杨等人要兴兵入关的行

为大怒并决心要把杨这群野心家赶出去,因此杨与郭的矛盾不可调和。后来张作霖采纳杨的建议,在日本援助下,打败了郭松龄并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事后还要将郭松龄部下一网打尽,终因张学良等人从中保护,才使杨无计可施。1926年,日本有以杨代张的想法,杨便乘机与日勾结并派亲信去日本活动。杨还用欺骗的手段骗取日对他的信任。一次,日本人在《满洲日报》上搞民意测验,查看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人的威信。杨趁机与日人联系,大量买报,并指使人填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寄给报馆,骗取荣誉。由此可以看出他卖国的丑陋嘴脸。杨还在奉系集团内寻找同党以便排斥异己。1926年代初,他就想把旧派插进奉军,企图掌握军权,但无机可乘。于是,他就建立预备军,储备日本旧派的嫡系军官。此阴谋被郭松龄识破,未能实现,但他的野心是没有减小的。

在杨宇霆的同伙中,常荫槐可以算是一个极端人物。杨、常二人结成死党,“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常荫槐工作大胆、泼辣,敢作敢为,但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他尤其敢轻视张学良,说他“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每与张学良研究公务时,常总是“口呼汉卿,漫不为礼,且独断专行,上峰之意见尚未定,则已以己意行之。”平时,常与杨打得火热,相互支持,但对张学良,却很疏远,处处掣肘。杨要扩充兵工厂,缺乏经费,常答应可以从铁路方面给予支持,但在这之前,张学良曾要铁路拨款若干补充军费不足时,却常遭拒绝。由于杨、常二人串通一气,对张学良“事无巨细,多方阻挠,有意架空”,这就逐渐成了张学良的心腹之患。退一万步说,人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当杨、常两人还为“元老”身份沾沾自喜时,枪口已经对准他们的太阳穴了。

1926年11月14日下午,杨、常一起来见张学良,合力要挟张在他们已经拟好的计划上签字,张对此事并不同意,要从长计议,可迫于无奈,只得推托说晚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就餐。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杨、常表示回去吃饭，相继辞去。之后，张学良就下定了杀这二人的决心，他找来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高纪毅说：“杨、常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签字，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高纪毅已把一切部署完好，大约在晚八点钟，杨、常二人再次来到大帅府的老虎厅。当他们刚坐下，高纪毅等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对杨、常宣布死令。杨、常闻听此言，不知所措。未等他俩开口，六名卫士已分组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枪响，杨、常饮弹而亡。

此举是为张学良扫除了心头之患，从此他可以在东北大展鸿图，但他的内心深处是自责的，对政敌采取“杀身”的办法，是不高明的，也是绝对不应提倡的，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为人民，为国家除掉了两只大蛀虫，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猿摇轻烟一缕祭任公

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书生能救国。
著论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
这幅对联出自丁传琳之手,表现梁启超一生之光辉,这是挽联一幅,这是哀情一片。

1928年 1月 12日午后 1时 15分,梁启超永远地睡着了。
近代中国的一颗新星殒落了。

梁启超的死有着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原因。经历了众多有着历史重大意义的大小事件之后,投身于治学任教的任公在心理上又遭受了一连串的折磨,导致了病发及恶化。

1927年,梁夫人李蕙仙身患癌症,于 12月病逝。

“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夫人的长别,使梁启超情绪低落而不能自拔,不久就出现了便血的毛病。由于大意和工作繁忙,久病不治的他终于在 1928年同意前往医院检查,并住院配合治疗。梁启超于 1月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院派最好的大夫,用最先进的设备为梁查验,最后确定梁的右肾上长了一个瘤子,应立即割去。12日手术完毕,但仍旧便血。显然这个诊断是不准确的。不过梁的精神很好,还比较乐观。出院后,用中药慢慢调养,小有成效。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底梁启超的四妹不幸病逝,梁启超思妹怀旧,感叹人生,情绪不稳,又开始便血。经名医治疗,稍有好转。1月,梁启超的好友曾习经患肺癌病世,死前之苦不可名状,梁启超亲眼所见,备受刺激,遂便血不止。可见梁启超的病情与心绪有着很大的关系,但在他此后的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两年中,一系列的事情向他突然袭来,使他无力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情趣。

1919年猿月愿日,梁启超激情满怀的为老师康有为的葬园大寿前来祝贺。谁知宴会上的余音未远,猿月猿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老师先已作古,使有病在身的弟子深感凄凉。然而,老师身后萧条,弟子汇去数百元,才草草入殓,这使弟子更倍感悲惨。回首当年师生携手的一幕幕历史剧作,在那样的心态下,梁启超的便血病又犯了。

1919年远月,王国维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投未名湖自杀。王国维和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是清华人学四大名教授。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几乎和王国维没有区别,加上多年和王的交往,更唤起了一片哀思和愤慨。梁启超本来不平静的心情更加起伏涌动,旧病的加剧是无法改变了。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学术界的斗士。在他生病期间,伴随着一连串精神打击的同时,仍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他在清华执教、不停地讲课、批改作业、接待客人、发表论文,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发表了《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书法指导》、《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等,总计在猿园万字以上。直至1920年,梁启超身体状况大为不好,血压不稳,便血间有,心脏亦在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出院之后的梁启超才辞去清华的一切工作,回天津静养。但他总是静不下来,又着手编辛弃疾年谱。可惜,这年谱却成了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他挥写多年的笔再也扶不起来了。

1920年圆月日,梁启超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

1920年1月1日,梁启超的灵魂走向了天堂。

梁启超的死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的结果,可以说是心理打击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医疗诊断的失误。

梁启超便血多年,1919年经几个医生的诊断被认定病在左

肾(应为右肾)需将左肾割去,可是在手术之日,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和任何毛病。虽然事实与推断产生了矛盾,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任公的病并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病还是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最后,病没有好,他们又说找不出原因来,这病没有什么要紧的。当时知晓这件事的很多人都很气愤,而梁启超的态度却还平和,他不希望社会上有过多的评论和批判,因为一向反对中国固步自封的,他不愿看到国人因此事而排斥西方医学。任公真的就是任公。

梁启超的一生是丰富、充实而充满了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幼年,后来中秀才、成举人、拜师康“圣人”,从进入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到领导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从担任《时务报》主笔,到执教湖南时务学堂,站在变法的潮头,展开维新的思想路;从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到与袁世凯握手合作;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到护国运动的主帅;从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到告别官场,漫游欧洲;从致力于文化教育,到治史求新研究佛学,这就是他短短五十六年人生的缩影。任公以他的存在给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需长篇大论的评价,仅从他的人生经历、成果、学术影响以及逝世后对各界的惊动,足以证明梁启超的人生价值。

源 阿富汗阿曼努拉时代的结束

阿富汗北面和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接壤,共同边界长达四千余公里,西面同伊朗相接,东面和南面与巴基斯坦为邻,东北端有一条狭长地带——瓦罕走廊同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连,是欧亚陆上交通的要道。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远征起,阿富汗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宗教在阿富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一直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在阿富汗曾有一个有胆有为的国王阿曼努拉。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实行了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使处于列强入侵中的阿富汗赢得独立。

阿曼努拉时代是阿富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但究其改革失败,王朝被推翻,根本原因早在阿曼努拉登基前就埋下了隐患。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在经济迅速上升,急欲扩大殖民地,瓜分亚非拉的历史时期。阿富汗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也使得自己在劫难逃。英、德等国在以各种方式表现着对阿富汗的垂涎。

随着新思潮的不断传入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阿富汗统治阶层内部也因其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的分化为不同的政治派别。青年阿富汗派是阿富汗影响最大的政治派别之一。这一派别在1905年俄国革命和亚洲觉醒的浪潮中诞生,其成员大多是

阿富汗的著名人士、知识分子、商人和官吏。他们领导了争取独立、争取改革、争取宪政、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这一派的最著名代表是塔尔齐，他的女婿、国王塔比布拉的第三个儿子阿曼努拉也是这一派的政治领袖。与青年阿富汗派相对立的是老年阿富汗派，其成员主要是僧侣和地主阶层。由于自身利益所驱，他们反对青年派提出的改革，反对引进新机器，反对创办现代学校——对传统的宗教教育形成威胁。两派所表现出来的分歧点主要是在对于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影响的看法上。但在反对英国人，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方面，两派观点是一致的。

1901年 9月 16日，国王哈比布拉被刺身亡。其弟纳斯鲁拉被老年阿富汗派立为新国王，但阿曼努拉在塔尔齐的协助下，立即行动，于 16日在喀布尔登基称王。作为中央军团司令兼喀布尔总督，他完全控制了首都的军队、行政机构和国库。本身已处于有利地位的阿曼努拉向全国发表改革声明，赢得了军队和政府官员的支持。纳斯鲁拉见大势已去，遂向阿曼努拉递交了效忠信。

阿曼努拉即位后，对内实施了一些颇得人心的政策，如取消封建徭役制——每年为国家无偿服劳役的“官丁制”，国家官员按法定数额征税，不得任意加码，增加士兵薪饷等，还以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为模式，建立了大臣内阁制。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权最终在全国建立起来了。在对外政策上，阿曼努拉主张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挣脱英国外交控制权、争取阿富汗的完全独立上。阿曼努拉宣布阿富汗是独立自由的国家，“世界上其它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各种权利，阿富汗也应全部具有”。与奉行亲英政策的老国王哈比布拉相比，阿曼努拉使全国民众充满信心，无比振奋。

争取独立是阿富汗人民的夙愿，也是国家繁荣进步的保障，成了阿曼努拉希望实现的第一个目标。1901年 7月，国王以“自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由独立”的阿富汗政府名义 致函英印总督 ,要求修改 1919年英阿条约 ,并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英阿条约。在时隔数日的复信中 ,英印当局傲慢拒绝承认阿富汗的独立 ,而且要求阿政府履行早先缔结的奴役性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义务。与此同时 ,英印当局在边境上集结军队 ,进行武力恫吓 ,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19年 缘月 猿日 ,英国侵略军向阿富汗伯尔山口的边防军发起进攻。阿军奋起反击。在清真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 ,阿曼努拉正式宣布展开“圣战”。阿富汗人民第三次抗英战争开始了。

虽然阿军装备落后 ,但士气十分高涨 ,作战勇猛而出色 ,在以弱对强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 ,阿富汗人英名远扬 ,南亚地区就流行着这样的谚语 :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三样事物是印度的响尾蛇、孟加拉的虎和阿富汗人的弯刀。足见阿富汗弯刀威力之大 ,阿富汗人斗志之勇。在已取得辉煌战果的情况下 ,阿曼努拉主动提出媾和建议 ,将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之上 ,尖锐而又漫长的斗争在继续。1919年 愿月 ,签订英阿停战协定。与此同时 ,阿富汗政府积极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先后同苏联、土耳其、波斯签订盟约 ,并且派代表团出访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 ,在外交上取得了进展 ,终于迫使英国代表团于 1919年 10月 10日在条约上签了字 ,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 ,双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但英国为了继续控制阿富汗 ,尤其在经济上还是保留了一些特权。

阿富汗获得独立后 ,国内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阿曼努拉执政期间 ,一共颁布了 190多项改革法令 ,涉及行政、法制、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内容。阿曼努拉废除旧制 ,宣布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 ,以国王领导下的大臣内阁制取代王室管理体制 ;颁布了阿富汗历史

上第一部宪法,反对宗教、语言、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歧视;废除奴隶制;开始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颁布了兵役法,建立第一支阿富汗空军,普及本民族语言普什图语,在教育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更为突出。宪法提出实行义务初等教育,并开设了普通中学和有外教的外语类中学,规定远一岁儿童实行男女合校。王后苏莱娅亲自在马斯图拉特女子中学执鞭授课。政府还先后派遣数百名学生赴法、德、土、苏、意等国留学。青年阿富汗派在教改方面的成绩有口皆碑。此外,政府颁令取消了部落和宗教领袖的许多特权,废除了一切贵族头衔和等级,颁布婚姻法,禁止买卖婚姻和多妻制;规定在京官员和议员一律穿西服、戴礼帽,不得戴传统的羊皮便帽和头巾,军官一律穿“哈基”,阿曼努拉对妇女戴的面纱也大为抨击,提出废除。

阿曼努拉在国内推行改革,推进了阿富汗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阿富汗缺乏一个能够与部族分裂势力和宗教势力相抗衡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改革成果没有保障。而且阿曼努拉的许多改革措施照搬外国经验,超出了国民的承受水平,尤其是政策上的操之过急与过激,引起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不满。有些人虽身穿西服,但仍舍不得扔掉他们传统的头饰,据说阿曼努拉还亲自动手,扯掉人们头上的缠巾。诸如此类的措施,弄得人心惶惶,结果是部落首领和宗教势力乘机作乱,局势日趋动荡。在反对改革的浪潮中,英帝国主义者推波助澜,极力煽动,深入阿富汗部落,通过阿訇们进行反对阿曼努拉的宣传活动。一些保守分子在各地散发苏莱娅王后在欧洲不戴面纱出席宴会的照片,宣称“国王已经背叛了伊斯兰教”。(根据伊斯兰教义,妇女外出必须戴面纱)。在这传统宗教情绪一次次被挑拨的时候,被称为“挑水夫之子”的巴扎·萨科乘乱起事,纠集了两千多人向首都喀布尔进攻。当时王国部队的主力正在外镇压辛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瓦里族的反抗,因而首都的防御十分薄弱,加之大批没有发饷的士兵纷纷倒戈。1929年11月,喀布尔失陷,阿曼努拉逃往坎大哈,巴扎·萨科宣布自己为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到坎大哈以后,曾组织了一支包括地方驻军和桂兰尼部族武装在内的阿富汗人民军向喀布尔反攻,但遭失败。阿曼努拉见复位无望,几经辗转逃往意大利,开始了流亡生活。阿曼努拉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虽然巴扎·萨科只做了几个月的国王,就被阿曼努拉王朝的一个叫纳蒂尔汗送上了绞刑架,但是必须承认就是一个“挑水夫之子”的小势力推翻了有名的阿曼努拉王朝。如果当时的民众起来支持平叛呢?如果当时的军队不倒戈呢?为什么纳蒂尔汗几个月前就不能将巴扎·萨科送上断头台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一个要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在列强虎视眈眈的眼中生存是不容易的。而且更关键一点在于:不是一切的变革都是越彻底越好。阿曼努拉的改革进程超出了民众的心理承受水平和实际生活能力。改革的目标必须与速度相平衡,否则良好的愿望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阿富汗经济落后,购置军事装备等又要投入大量经费,一系列的财政问题,最终让百姓感受到的最直接的还是税收压迫,没有好日子过,生活的苦楚与宗教感情上的不满相碰撞,终于迸发出叛乱的火星。

阿曼努拉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它在阿富汗历史上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使与世隔绝的阿富汗恢复了民族独立,第一次与欧亚各国建立了外交、文化和商务关系,现代化改革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法则和文化观念注入其中,这一历史的必然进程是任何保守势力所无法逆转的。同时,阿曼努拉政权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种种教训,决定了以后王朝渐进式地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缘起李子洲的被捕与牺牲

1949年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对于共产党来说，它却是个“大熔炉”，炼出了真金，扔掉了杂质。一些懦弱的人投降叛变，而且还牵连到其他革命志士，李子洲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的。1949年11月底，陕西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圆月圆日深夜，李子洲和党团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刘继曾、李大章等先后被捕，关进西安市西华门敌军事裁判处看守所。

敌人抓到李子洲等省委负责人后，对他们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梦想从他们身上捞到我党的主要机密。圆月猿日，敌军事裁判处处长亲自审问李子洲，但一无所获，只好草草收场。回到牢房，李子洲和刘继曾分析研究面临的情况，感到可能会有叛徒出卖，决定加强对被捕党员的教育工作，密切注意狱中党员的表现，并对开始动摇的一些党员，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经得住考验，对一些行迹可疑的人，则提高警惕。在这种危险时刻，自己的生命随时会失去，李子洲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党的安全，这是可贵的。几天后，敌人又审问子洲，要他供出渭华暴动中党的活动情况和党的文件藏在哪儿，继而恫吓，扬言要施以毒刑。但革命者的意志力是不可摧的，敌人仍然无法从他的口中得到半点党的机密。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约在李子洲入狱一个月后，肖振瀛就是一开始审讯李子洲而碰了一鼻子灰的那个笨处长，他命令卫兵一律卸掉狱中政治犯的脚